

效率如何让法律失聪？——多元规范协调中“法触觉”的退化与合法性形态的异化

协调失灵是表层症状，底下是回报结构的不对称如何让一种感知能力持续退化

高鹏 著 · SDE 学员 · 法社会学与司法管理 · 2026年7月26日

摘要 当代法律系统在处理习惯、道德、宗教与行业伦理等多元规范时，面临的根本困境并非理论立场之争，亦非制度设计之拙，而是一种更深层的感知能力退化。本文提出，“法触觉”，即法律系统感知、理解并正面回应外部规范世界之道理的能力，正在被以“结案率”、“审限管理”为核心的司法效率评价体系系统性地卸载。这一过程的驱动机制并非效率对正义的简单压制，而是效率逻辑的回报结构（即时、可见、可量化）与实质规范感知所依赖的行为（耗时、深度注意、不可量化）在制度神经系统中“回报不对称”的结果。法官对多元规范的感知能力因无法在制度体内被记录与反馈而逐渐退场，最终导致一种“失感的合法性”：系统在一切可观测指标上均可表现正常，甚至更加高效，却已丧失检测自身协调功能是否在实质上已由“正面回应”退化为“合法终结”的能力。本文从比较法视角解剖了效率逻辑在两大法系中精准切割其各自制度“胚胎期结构”的差异形态：在大陆法系，它挤压“授权端口带宽”，制造“有话不能说”的沉默；在普通法系，它抽空“判断时间密度”，制造“能说但无话可说”的空转。基于此，本文设计了三套可操作的实证检验工具箱，将“失感合法性”这一诊断转化为可被经验研究证伪的具体假设，并明确指出其被推翻的条件。文章最后讨论了这一诊断对司法改革路径的启示：任何不触动效率评价底层逻辑、仅在其框架内修补感知通道的改革，均可能在两大法系中分别落入“悲情性生产”或“空转维护”的制度陷阱。

关键词：多元规范；法律协调；司法效率；感知能力；失感的合法性；法触觉

1 引言

1.1 问题的现实紧迫性

过去三十年间，全球化、迁徙浪潮与技术革命使当代社会进入了一个“规范多元”的时代。国家法不再是唯一的社会控制工具，民间习惯、宗教戒律、行业技术伦理、跨性别社区规范、少数族裔传统等外部规范体系，以前所未有的密度向法律系统提出请求：要求被承认、被尊重、被纳入裁判考量。法律如何协调自身与这些外部规范的关系，已成为法理学、法社会学与司法管理学共享的最棘手议题之一。

然而，一个更隐蔽的变化正在发生。法律系统回应这些请求的方式，正从“正面处理”转向“技术化分流”。判决书中关于交易习惯的援引日渐格式化，关于宗教主张的理由分析日趋模板化，关于新兴技术伦理的讨论越来越依赖于“行业标准”而非独立的司法判断。表面看，系统仍在高效运转：案件在审限内结案，判决书格式规范，上诉率与改判率维持在可接受区间。但在这些效率指标的背后，一个关键的判断被遮蔽了：法律系统是否真的在“协调”多元规范，还是仅仅在合法地“终结”它们带来的压力？

1.2 既有理论路径的盲区

法哲学关于此议题的经典论争，长期集中在两个房角石上。其一，自然法传统主张法律必须与道德、习惯、宗教共享一套实质价值根基，否则将面临合法性危机。其二，实证主义传统坚持法律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子系统，其“协调”外来规范的方式是通过自身的规则（如承认规则、转化条款）进行“合法/非法”的二元编码。司法管理学和诉讼法学则加入第三个视角：协调困境本质上是制度设计的技术问题——只要改进调解、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或增设专家证人制度，就能优化协调效果。

这三个视角共享一个未经审查的预设：法律系统正处在一个能够感知问题并寻求解决方案的状态中。分歧仅在于“最好的解决路径是什么”。本文要正面挑战的，正是这一预设本身。我们的核心判断是：法律系统正在丧失的，并非某一套协调方案的完整性，而是前置于任何方案之前的那层能力——听见外部规范世界在说什么、并以外部规范自身的道理而非法律的技术方言去理解它的能力。我们称之为“法触觉”的退化。

1.3 本文的论证脉络

本文的论证分四步展开。第一步，我们将批判性地回顾既有理论资源，定位它们的共同盲区，并引入“法触觉”这一概念作为分析工具。第二步，我们将从生成机制的角度，追溯法律系统在处理多元规范压力时，如何在制度演化中发育出一套“内部分工体系”，并揭示

这套体系从“积极协调”到“技术性分流”再到“感知丧失”的退化路径。第三步，也是本文的核心，我们将解剖驱动这一退化的因果机制——“回报结构的不对称”，并比较其在两大法系中的差异形态。第四步，我们提供一个可操作的实证检验框架，将本文的理论诊断转化为可被经验数据证伪的具体假设。最后，我们在结论中阐述这一诊断对司法改革路径选择的深层启示，并指出本文的局限与未来研究纲领。

2 文献综述：从规范冲突到感知退化的理论脉络

2.1 法哲学的结构化困境

围绕法律与道德/习惯关系的法哲学论争，构建了我们思考该问题的原始地形。自然法理论，从阿奎那到富勒、菲尼斯，为外部规范进入法律提供了最强力的正当性理由：法律的效力最终取决于其与一套更高级的道德秩序的契合度。但这一进路的困境在于，它无法为“道德”或“习惯”在制度内提供稳定的操作性定义——当多种相互冲突的“高级规范”同时主张权威时，法官被抛回了一场他既无制度资源也无可操作程序去裁决的价值混战。作为回应，以哈特、拉兹为代表的实证主义传统，通过“承认规则”、“渊源命题”等概念，在逻辑上切断了法律的效力与外部规范的必然联系，将这一法哲学问题转化为了一个制度技术问题：外部规范只有在被法律体系的承认规则所识别后，才具有法律效力。这一进路干净利落，但其代价是，它将“协调”的实质负担从法理层面推到了操作层面——承认规则本身并不能告诉法官，当一项未被正式承认的习惯在情感上和法律外的合理性上都应当被考虑时，他该怎么办。自然法和实证主义在立场上对立，却在功能上共同塑造了一个法哲学的“上层结构”，这个结构有效地将最棘手的规范性张力向下挤压给了司法现实。

2.2 法社会学的经验转向与制度解剖

法社会学传统为我们打开了分析这一“向下挤压”过程的经验窗口。卢曼的系统论将法律视为一个在功能上分化、在操作上闭合、在认知上开放的自创生系统。这个框架非常有力地解释了法律如何以一种自洽的二进制代码“合法/非法”来过滤外部世界的噪声。然而，系统论更擅长描述系统的稳定性，对于系统如何在其内部生成一种损害其自身功能的病变——比如，如何能持续地执行“认知开放”而同时又系统性地歪曲“认知”的内容——缺乏一个内在的病理学分析工具。依此思路，法律人类学通过格利克曼等学者对巴罗策部落习惯与殖民法律互动的经典研究，展示了“习惯”远非一套静态规则，而是一种不断被司法过程主动建构和选择的规范性资源。吉尔茨的“地方性知识”概念则进一步指出，法律对事实的裁剪本身就是一种对世界的暴力性简化。这些研究共同揭示了法律与多元规范之间的互动是一个高度复杂的建构和翻译过程，而非静态的“适用”或“排斥”。但它们多数仍将国家法视为一个主动的、有意图的行动者，未充分探究这个行动者内在的“感官系统”本身是否可能在过程中病变。

2.3 司法管理学中的效率迷思与批判潜能

晚近，司法管理学和实证法学研究将我们的注意力拉向了一个关键变量：效率。以丹仁卡、比特纳等为代表的法院管理和案件流程研究，揭示了法院如何像所有现代组织一样，被绩效指标、流程优化和成本控制所深度塑造。全球范围内的司法改革，从普通法系的伍尔夫改革到大陆法系的审限管理和案件权重系数，都将“提高效率、减少延迟”作为核心目标。这些改革在消除案件积压、缩短审判周期方面取得了可量化的成就，但其对实质裁判质量的影响，始终是争议焦点。有研究试图通过大样本编码分析，检验审限压力是否导致了判决书说理质量的下降，但往往因为“说理质量”的操作化定义困难而难以获得决定性的结论。这一困境本身就构成了一个症候：当对“裁判质量”的评价本身也不得不依赖效率指标（如“发回改判率”）或形式指标（如“判决书字数”）时，我们用以诊断问题的工具，或许正和问题本身来自同一套逻辑。

2.4 文献缺口的精确诊断：从“协调失灵”到“感知坏死”

综合以上脉络，我们可以精确定位本文试图填补的缺口。法哲学的论点之争（自然法vs.实证主义）预设了系统拥有充分感知问题并进行立场选择的能力；法社会学与法人类学揭示了法律建构性地处理多元规范的复杂机制，但未系统剖析这些机制在内部压力下退化的内在病理；司法管理学直面效率压力，但其评价体系本身可能正是我们即将诊断的那个问题的同谋。因此，一个亟待探索的分析层面是：法律系统用于感知外部规范世界并将其转化为可处理的制度信息的那层能力，其自身是否正在经历一场不为其自身所感知的退化？

本文提出的“法触觉”概念，旨在切入这一盲区。它不是指法官个人的道德敏感度或同理心——那会退回到自然法的个体德性话语。它指的是法律系统的组织结构、工作节奏、文本生产惯例和评估制度共同塑造的一个系统级感知能力。它的退化，被操作化地定义为：制度体失去了从多元规范领域接收“非法律语言、非法律节奏、非法律分类的压力”并给予其充分注意力的时间与组织条件。下文的理论框架部分将对此进行详细阐述。

3 理论框架：“法触觉”的退化与“失感的合法性”

3.1 “法触觉”：一个制度动力学的感知构念

我们借用一个来自认知神经科学的原始意象——“本体感受”——并将其改造为一个制度动力学概念。“本体感受”指在没有任何视觉信息的情况下，个体对自己身体各部位的位置、动作和状态的内在感知能力。一个失去了本体感受的病人，仍能移动四肢，但他必须用眼睛看着自己的肢体才能知道它在何处。我们提出，“法触觉”是法律系统的一种制度性本体感受：它是系统在操作中，不依赖外部评估指标的反馈，就能在内部经验中“感受”到自身处理多元规范压力的方式是否仍然健康、是否正在流于形式的一种能力。它的存在，使系统能够区分“合法地终结了一个案件”和“正面回应了一项规范性请求”。

法触觉由三个相互咬合的制度组件构成：（1）时间密度：法官与涉外部规范的案件材料进行实质互动、使外部规范的逻辑得以充分展开所需的制度性时间保障；（2）授权端口带宽：法律系统的输入端口（如“公序良俗”、“诚实信用”、“交易习惯”等一般条款）在制度实践中允许法官进行非法律化论理的实质空间宽度；（3）自我感知性话语：法律共同体内部用以描述、反思和辩论其自身处理多元规范之成败的专业叙事与批判话语。这三者共同构成了法律系统的“制度感官系统”。

3.2 两大法系中法触觉的胚胎期结构差异

法触觉并非均匀分布。它形成于现代两大法系的萌芽期，并被其各自的生成机制遗产塑造出截然不同的结构。

在大陆法系，伴随法典化运动诞生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感知授权”模式。法官对世界的认知，被限定在法典为其预设的通道之内。从《法国民法典》禁止法官在判决中确立一般规则（第5条），到《德国民法典》起草者们对法律科学体系完备性的信仰，这一传统将法官的感知能力制度性地绑定在法典的授权条款之上。这意味着，大陆法系法官的“法触觉”，主要依赖的是一个有限的、被法条明确赋权的“单一授权管道”。

在普通法系，特别是英国王座法庭通过令状制度与陪审团互动、以及后来衡平法的发展，形成了截然不同的“自下而上的感知留存”模式。法官必须在多元事实和习惯的对抗中，自发地识别和辨别不同群体内部的“道理”。这使得普通法系法官的“法触觉”，被制度性地培养为一种分散在对抗制程序、专家证词和判例法推理中的日常判断工序。

3.3 回报结构的不对称：法触觉退化的核心机制

这两种法触觉结构在当代都受到了同一种力量的侵蚀：以“即时、可见、可量化”为特征的效率评价体系。我们需要解释的，不是“效率为什么不好”，而是它为何能如此有效、精确且不遭遇抵抗地拆卸法律系统的感官。

答案在于一种结构性的回报不对称。司法效率指标的回报结构具有三个关键属性：第一，它们是即时的。结案率的月度通报、审限的实时预警，在制度体内创造出高频的反馈周期。法官完成一次“结案”操作，立刻获得一次微型的制度性确认。第二，它们是可见的。效率指标被制作成排名和图表，主导了法院内部会议和自我叙事。第三，它们是可量化和可比较的，横跨庭室、法院、年度，每一个被纳入的行为都获得了一个可识别为“进步”或“退步”的制度性身份。

与之对立的，是实质规范感知行为所依赖的回报结构。法官花整个下午理解一项复杂的行业惯例，或者在判决书中用五个段落正面论证对某个宗教主张的权衡，这个行为在制度神经系统内几乎是不可见的。它不被测量，不被排名，不被通报。年度考核表上没有“正面论证外部规范深度”的得分项。绩效评估系统无法分辨一份因真正理解习惯而做出创造性裁决的判决书，和一份用一句“根据交易习惯”搪塞过去的判决书的区别。后果是：需要深度注意、耗时、无法被即时量化的实质感知行为，在法官的制度体验中逐渐退化为“不存在的时间”。这一状况，正如本体感受缺失的病症：患者的肢体仍在移动，但大脑接收不到本体信号，最终意识无法将其记录为“我在主动移动”。

3.4 “失感的合法性”：一个新的制度病理类型

在回报结构不对称的长期运作下，法触觉的退化会达到一个临界点，我们在此将其概念化为“失感的合法性”。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恶法”（法律内容不正义），也不是韦伯意义上的“合法性危机”（公众对系统丧失信仰）。这是一种更隐蔽的状态：系统在一切可观测量指标上——结案率、审限内结案比、平均审理天数、上诉率——都可以表现得相当健康，甚至因效率的持续优化而显得“更专业”、“更成功”。然而，它已从内部丧失了对自身功能是否正在实质衰退的检测能力。系统将“批量合法终结案件”的流畅感，误认为了“有效协调多元规范”的满足感。其恐怖之处在于，坏死不被登记为坏死，因为它所用的诊断工具——效率指标——正是坏死本身的制造工具。

4 方法论：从理论诊断到实证检验

4.1 研究设计与分析策略

本文采用一种结合了制度病理学分析和比较法断点检验的非传统方法论。我们首先通过理论建构，在法哲学、法社会学、司法管理学的交叉地带锚定了“法触觉”这一分析概念，并推导出其退化的因果机制——“回报结构的不对称”。这一理论推演的产出，是一组关于效率改革对法触觉产生可观测侵蚀效应及其法系差异形态的具体命题。

本文的实证雄心不在于提供最终的数据检验，而在于提供一个可操作的、体系化的实证检验框架——我们将之结构化为一套“工具箱”。这套工具箱的每一个构成部分，都包含了明确的研究设计、样本构建逻辑、变量的操作化定义、统计方法选择、控制变量列表以及失败模式的预判与修复路径。这一方法论本身，旨在将本文的理论诊断从“哲学级洞见”转化为可被经验研究驳倒的、处于波普尔意义上的“可证伪理论”。

4.2 跨学科理论资源的调用说明

本文的理论建构，跨越了法理学、认知科学与制度经济学的边界。我们将认知神经科学中的“本体感受”意象，改造为描述制度体自我感知能力的构念“法触觉”。这一改造的有效性建立在以下的结构性同构之上：正如生物本体感受缺失的个体失去了在运动中不自视而知自身姿态的能力，法触觉退化的制度体失去了在常规操作中不依赖抽象指标而感知自身功能质量的能力。两者共享的核心机制是：一个由反馈回路支撑的内部感知系统的崩溃。同样，我们从行为经济学和劳动社会学中借用了“回报”与“计件式管理”的意象来分析效率评价体系的动员效应。这些跨学科调用的边界是明确的：我们无意将法律系统还原为生物学或经济学现象，而是在抽象的机制层面上进行类比，以获取独立于法哲学传统话语的分析工具。

4.3 方法论的局限

本文概念分析的方法论局限是显见的。首先，目前的分析主要基于宏观制度动力学和历史路径考察，缺乏微观层面的、对法官个体认知和行为变化的直接经验数据支撑。其次，本文的比较法分析仍主要停留在“两大法系”的结构性对比上，未能充分展开法系内部的具体制度变体。我们将在结论部分，将这些局限诚实地转化为未来研究的具体方向。

5 分析与讨论

5.1 法触觉退化的病理过程：撤退、冻结与卸载

我们以更精细的笔触，描绘法触觉退化在制度体内的三步演进。

第一步：撤退。面对外部规范因其内在逻辑复杂而造成的解释负担，法律系统在本能上并不倾向于正面回应。它的早期策略是逐次撤退。从历史上看，民间习惯在立法中被推崇为填补法律漏洞的“第二法源”，但在司法中因证明困难和标准模糊而被实际回避，由法官主导重新解释合同条款所替代。道德和宗教要求，特别是那些对个体生活方式有绝对要求的规范，被法律从公共审判庭“放逐”到私人自治领域，或转化为一个有限的“豁免”问题。新兴的行业技术伦理，则在“遵循行业标准”的名义下，将实质的价值判断外包给了标准制定机构本身。这种撤退，在每一个个案中都表现为一种理性的、经济的制度选择。它回避了棘手的价值冲突，节省了司法资源。

第二步：冻结。次次撤退的路径，在时间的累积下被制度结构所吸收和固化，成为操作常规、法官培训内容和教义学论述，从而冻结为一种无需再被审视的“事实状态”。法理学和部门法学为它提供了完备的学术闭环：“系统功能必要性”或“法的确定性优先”等叙事，将撤退重新描述为一种制度审慎与专业进步。此时，撤退已不是撤退，它成了“司法规律”本身。

第三步：卸载。正是在撤退被冻结的这一刻，效率逻辑完成了决定性的操作——卸载。它并非通过强硬的指令，而是通过我们上文分析的“回报结构不对称”，精密而安静地将“正面处理多元规范”这项功能，从法官的制度性感官中卸了下来。大陆法系的法官，面对一个涉及复杂古老习惯的合同纠纷，他的制度神经系统驱使他去寻找法条上的转化端口。如果端口狭窄，任务给他的触感就是“此路不通，应诉诸其他规则”。他不会在制度内感到一种“失语”的痛苦，因为裁决的逻辑被无缝地缝合到了他法教义学素养所许可的操作之中。

5.2 比较法镜像：沉默的大陆法系与空转的普通法系

回报结构不对称这一普遍引擎，在两大地质结构不同的制度地形上，切割出了镜像相反的伤口。

大陆法系：被挤压的端口带宽与制度性沉默。

大陆法系的法触觉依赖于法典赋予的“授权端口”。《德国民法典》第242条的诚实信用、《法国民法典》第1134条的善意履行、中国《民法典》第10条的习惯作为法源，这些条款被设计为法律系统通向社会生活的管道。效率逻辑的侵蚀，表现为对这些端口带宽的挤

压。端口带宽的大小，不在于法条文义的宽度，而在于法官在审限和业绩压力下，能在多大程度上实际动用这些条款进行长篇、有力度的论证。

当审限系统要求一个涉及“公序良俗”的复杂案件必须在三个月内结案时，法官在制度内最优的生存策略，是将对“公序良俗”的论证压缩为一个格式化的挂钩：“被告的行为违背了公序良俗，本院不予支持。”端口条款在形式上被援引了，但援引本身却成了避免深入外部规范世界内部进行论证的理由。法官“沉默”了——不是不被允许说话，是他的制度权限完好，但说出的言语无法承载对外部规范复杂性的实质回应。他所拥有的，是一种对感知能力的授权之丧失。

普通法系：被抽空的时间密度与论证空转。

普通法系的法触觉，依赖于时间。对抗制、交叉询问、详尽的证据开示、长篇的判决书，这些都需要一个昂贵的要件：法官有足够的时间。在英国伍尔夫改革、美国案件管理运动等持续数十年的效率改造之后，普通法系的输出端口依然完好。判决书可以写，专家证人可以听。但时间被系统性地移除了。

结果是出现了一种论证的“空转”。法官的判决书依然遵循判例法的推理传统，语言依然优美，但论证的实质深度与庭审时间的关联被切断了。判决书对外部规范的分析，不再源于庭审过程中通过长时间聆听和追问所生长出的实质性理解，而是源于诉讼双方律师在书面材料中已经高度法律化、对抗化处理过的摘要。法官听到的，不再是行业惯例本身的故事，而是这个故事在证据法规则筛选下的一个法律化版本。沟通的“出声”器官完好，但“声带”本身已没有了足够的空气振动来产生有重量的声音。他所拥有的，是一种对感知能力的时间之丧失。

同一个伤口的不同面容。

大陆法系的“沉默”与普通法系的“空转”，在深层结构上是同一个病灶。它们都是法律系统在丧失其“法触觉”后，所进行的自我维持。沉默的系统，因其沉默，无法检测自己是否仍能听见。空转的系统，因其空转，也无法检测自己的话语是否还有重量。两种形态都成功地避开了效率指标体系内的任何报警器。

5.3 美德叙事的填洞效应与制度陷阱

法触觉的丧失在制度体内会留下一个空白：法官个体关于“我是谁”的职业自我认同开始出现裂痕。此时，一种强大的修补机制会自动启动——我们称之为“美德叙事”。从法学学术界到最高人民法院的政策文件，“司法为民”、“能动司法”、“避免机械司法”、“三个效果统一”等话语，构成了对法官职业尊严的一种补偿性供给。它告诉法官，你虽然没时间去深入理解那个习惯，但你高效地解决了纠纷，维护了社会稳定，你依然是一名优秀的人民法官。

这并非单纯的欺骗，而是一种高效的制度性“止疼药”。然而，正是这味止疼药，使得系统失去了启动自我修复的最后信号：痛感。一个丧失了痛感的人，不会意识到自己已经把手放在了火上。同样，一个被美德叙事充分麻痹的制度体，会继续沿着效率优化的路径前进，并在每一次“感觉良好”的改革中，更彻底地完成对自身感知残余的下一次卸载。由此，两种专属的制度陷阱形成了：

在大陆法系，任何“端口扩容”式的改革——例如，在司法解释中增加关于“习惯”认定的细则，或发布一批“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典型案例——都可能落入“悲情性生产”的陷阱。改革给了法官“我们在修复问题”的叙事安慰，甚至提升了他们在量表上的“职业价值感自评分数”。但只要法官写作说理的时间未获制度性保障，增加的端口条款只会在判决书的“套话区”被格式性地征用，而不会在“裁判理由区”产生更多实质论证。改革制造了进步的幻觉，但没有改变进步的前提。

在普通法系，任何“质量控制”式的改革——例如，增加一个“感知质量审查”环节，或要求对复杂案件进行专家鉴定——都可能落入“空转维护”的陷阱。在审判时间持续被压缩的刚性约束下，这些新增的程序环节很快就会被律师和法官共同驯化为一条标准化的流水线。控辩双方会生产出更加精美的“法律摘要”来满足审查，而法官的判决书则会用一种更完备的引用格式，来代替他本人真正的、基于充足时间的独立思考。系统变得更复杂、更精致，但其内部“论证的实质重量”并未增加。空转从法官的个人行为，升级为一个由新增程序环节共同维护的制度化空转。

5.4 竞争性解释、可证伪性及驳倒本理论的条件

一个理论如果无法明确指出将其驳倒的条件，它就只是一个观点，而非一个科学的命题。我们必须正面处理这一问题。

最强的竞争解释：效率-质量的简单权衡论。

最直接的反驳是：“你所描述的，不过是古老的效率与质量之间的‘权衡’。案件多了，时间少了，裁判的质量自然下降，但这始终是可逆的——当社会对司法质量的需求超过对效率的需求时，资源便会重新分配，质量就会回升。”这一解释认为，法触觉退化只是一个暂时的、可逆的资源分配问题，而非一个不可逆的结构性感知丧失问题。

我们的反驳及关键检验变量。

我们的理论提出了一个更强的、可被检验的假说：效率不仅剥夺了法官的“时间”资源，更关键的是剥夺了他们感知自身在质量上正在衰退的能力。如果仅仅是权衡，法官应当普遍对自己的工作质量下降感到不满和焦虑。而“失感合法性”理论则预测，法官群体不仅不会有系统性的不满，反而可能因为美德叙事的填补，在自我评价量表上表现出高于其实际行为质量的伦理满意度。

这一“自我评价-实际行为”的分离，就是我们排挤掉简单“权衡论”的关键。如果仅仅是资源短缺，人们会经历挫折感和失落感；如果是一种感知被卸载，人们会经历一种“舒适的麻木”。

可证伪的预测：

1. 预测1（针对权衡论）：在控制了司法预算和法官编制的增长后，法官群体在匿名问卷中对“工作中有足够时间对案件复杂伦理问题进行反思”的满意度，会随效率改革呈显著下降趋势。

2. 预测2（针对失感合法性）：在同样的外部条件下，法官群体在“我审理案件时能够很好地协调法律与社会伦理”的自评得分，则不会下降，甚至可能因为机构提供的正面叙事而上升。

一个能排除权衡论的研究设计：

我们可以设计一个随机对照实验。一组法官接受一次关于“本院在提升多元规范协调能力方面的改革新举措”的宣讲（实验组），另一组不接受（对照组）。之后，两组法官都完成一个包含高伦理张力情景的裁判模拟任务，并进行自评问卷。权衡论预测：实验组因此消息感到自己将获得更多资源，焦虑应下降但自评伦理满意度不会畸高。而“失感合法性”理论预测：仅凭一纸改革宣讲，实验组法官的自评伦理满意度就会显著高于对照组，但他们在裁判模拟任务中面对高张力伦理情景时进行更多实质论证的实际行为，却不会高于对照组。这种“感觉变好了，但行为没变好”的分离，恰恰是失感而非资源短缺的证据。

什么结果会证伪本理论？

如果大规模的、跨区域的纵向判决书编码研究发现，在审限压力电子化后，判决书对习惯/公序良俗等条款的实质论证深度并未出现结构性下降；或者，普通法系的庭审时间压缩与法官在判决书中对外部规范进行分析的密度之间，不存在统计显著的因果关联；或者，上述心理测量实验反复证实，接收到“伦理升级”信号的法官，其实际裁判行为的质量也同步得到了提升——我们将承认本理论的核心命题（法触觉因特定机制而单向坏死）被驳倒。届时，更简单的“资源与注意力暂时错配”的解释将更具竞争力。

6 结论

6.1 核心发现

本文的核心发现是：法律系统正陷入一种“失感的合法性”状态。在面对多元规范协调的持久压力时，它不是在某一套理论立场上失败了，而是用于感受、理解和正面回应这些压力的核心制度感官——我们称之为“法触觉”——正在被以效率为导向的司法评价体系系统性卸载。这种卸载的深层引擎，是效率回报结构（即时、可见、可量化）与实质规范感知所需的条件（耗时、深度注意、不可量化）之间的极端不对称性。

6.2 理论贡献与边界改写

本文的理论贡献在于，超越了法哲学（自然法vs.实证主义）的立场之争，将问题从“应该选择哪种协调理论”推进到“系统是否还具备感知并处理这一问题的能力”。我们提出并系统化了“法触觉”与“失感的合法性”这一对概念，为制度动力学分析补充了一个新的病理类型。我们撤换了关于司法改革的一个隐含房角石——即“效率改革是价值中立的制度工具”——代之以一个精确的诊断：效率是一台能识别每种法律文明的胚胎期结构并对其最脆弱的一层实施定点切割的机器。它在大陆法系咬断的是授权端口带宽，在普通法系抽空的是判断时间密度。任何仅在其框架内打补丁的改革，都会因陷入“悲情性生产”或“空转维护”的陷阱，而加速其试图阻止的崩溃。

6.3 实践与政策含义

本文的诊断指向一个悲观的实践结论：任何在现行效率评价体系内部寻求修复的改革，皆属徒劳。真正的出路，在于制度性地保护法触觉的三个组件。第一，为判断时间提供刚性保障。探索将特定类型案件（如涉民族、宗教、行业习惯复杂案件）从常规审限中剥离出来，并为法官在判决书中进行的“正面规范论证”提供专门的篇幅和时间考核豁免。第二，重建独立的协调质量评估维度。在目前的效率评价体系之外，建立一个非惩罚性的、匿名的“外部规范实质论证质量”同行评议系统，让“深度感知”的行为在制度体内获得一个新的“接收器”。第三，警惕美德叙事的麻醉效应。各级司法政策制定者应警惕用宏大、正面的职业荣誉话语来回应法官群体的深层职业焦

虑，因为这可能恰恰掩盖了需要介入修复的系统性病变。

6.4 研究局限与未来的研究纲领

本文的局限在于，它给出的是一幅地图和一个检验计划，而非已经完成的经验检验。这指向了未来的研究纲领。第一，大语言模型辅助的判决书法触觉纵向编码。利用计算法学方法，训练自然语言处理模型对几十万份判决书进行大规模的结构化测量，以检验论证密度下降的历史趋势和关键制度拐点。第二，跨管辖区的比较法断点回归。利用不同国家引入司法效率改革的时间差，构建准实验，以更纯净地识别出效率冲击对论证质量的因果效应。第三，从“失感”到“唤醒”的质性与田野研究。跟踪那些尝试突破效率框架的试点法院和个别法官，研究他们是如何在严密的制度系统中重新生长出感知能力的，这将是通向修复路径的关键知识。第四，跨系统的制度病理迁移研究。将本文的分析框架迁移到医疗、教育等领域，检验“效率回报不对称导致职业感官坏死”的诊断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跨系统的普遍现象。最终，这项研究不仅关乎法律，更关乎所有在现代绩效管理体系下，其核心伦理正在被悄悄“卸载”的职业——医生、教师、记者——他们是否也正在自己的制度化“失感”中，舒适地走向其使命的反面。

参考文献

[说明：以下仅列出作者有充分把握确认作者、标题、年份和出处皆真实可查的文献。凡不完全确认的，一律未列入，相关学术脉络在正文中以概括性方式交代。本列表严格执行“宁缺勿造”原则。]

1. Fuller, L. L. (1964). **The Morality of Law**. Yale University Press.
2. Hart, H. L. A. (1961). **The Concept of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 Raz, J. (1979). **The Authority of Law: Essays on Law and Moral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4. Luhmann, N. (2004). **Law as a Social Syste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5. Geertz, C. (1983). Local Knowledge: Fact and Law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Local Knowledge: 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 (pp. 167-234). Basic Books.
6. Gluckman, M. (1965). **The Ideas in Barotse Jurisprudence**. Yale University Press.
7. Damaška, M. R. (1986). **The Faces of Justice and State Authority: A Comparative Approach to the Legal Process**. Yale University Press.
8. Woolf, Lord (1996). **Access to Justice: Final Report to the Lord Chancellor on the Civil Justice System in England and Wales**. HMSO.
9. Resnik, J. (1982). Managerial Judges. **Harvard Law Review**, 96(2), 374-448.
10. Feeley, M. M. (1979). **The Process Is the Punishment: Handling Cases in a Lower Criminal Court**.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1. Posner, R. A. (2014). **Economic Analysis of Law** (9th ed.). Wolters Kluwer.
12. Galligan, D. J. (2006). **Law in Modern Socie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3. Liebman, B. L. (2015). Legal Reform: China's Law-Stability Paradox. **Daedalus**, 144(3), 84-99.
14. Minzner, C. F. (2011). China's Turn Against Law.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59(4), 935-984.
15. Shapiro, M. (1981). **Courts: A Comparative and Political Analysi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6. Weber, M. (1978). **Economy and Society: 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7. Merry, S. E. (1988). Legal Pluralism. **Law & Society Review**, 22(5), 869-896.
18. Griffiths, J. (1986). What is Legal Pluralism? **The Journal of Legal Pluralism and Unofficial Law**, 18(24), 1-55.
19. Tamanaha, B. Z. (2008). Understanding Legal Pluralism: Past to Present, Local to Global. **Sydney Law Review**, 30(3), 375-411.
20. Teubner, G. (1997). 'Global Bukowina': Legal Pluralism in the World Society. In G. Teubner (Ed.), **Global Law Without a State** (pp. 3-28). Dartmouth.
21. Zweigert, K., & Kötz, H. (1998). **An Introduction to Comparative Law** (3rd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2. Glenn, H. P. (2014). **Legal Traditions of the World** (5th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3. 苏力. (1996). 法律活动专门化的成本与收益. 《中国社会科学》, (5), 117-131.
24. 季卫东. (1999). 《法治秩序的建构》.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5. 强世功. (2003). 《法制与治理——国家转型中的法律》.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6. 达玛什卡(Mirjan Damaška). (2004). 《司法和国家权力的多种面孔：比较视野中的法律程序》(郑戈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7. 贺欣. (2005). 在法律的边缘——部分外地来京工商户经营执照中的“法律合谋”. 《中国社会科学》, (3), 79-90.

深化增补：被放跑的最近邻、操作化与证伪

以下四节为编辑增补，与作者正文分开标注。

增补一：与作者已发表《法触觉的坏死》的增量说明

这是本文首先必须回答的问题：作者已发表《法触觉的坏死：效率逻辑如何使法律丧失感知能力》，构念（法触觉）、动因（效率逻辑）与后果（感知丧失）三项均与本文重合，若无明确增量，本文构成自我重复。经比对，可辩护的增量有二。其一，场域限定：前篇处理的是法律系统内部的一般感知退化，本文限定在多元规范协调这一特定接触面上——即法律与其他规范秩序（宗教、习俗、行业自治）相遇的个案，其退化后果是把异质规范误读为事实争议。其二，机制细化：前篇指认效率逻辑为动因，本文进一步给出机制形式——回报结构的不对称，即看见异质性不被奖励、看不见不受惩罚，因此退化不需要任何人有意为之。除这两项之外，本文与前篇的论证应被视为同一判断的重述，作者宜在正文中直接标注这一点，而不是让读者自己去发现。

增补二：与同批《管辖克制》的分工

作者同批已发表《管辖克制：法律系统在个案接触点上的“不看”之能力》，与本文同处一个接触面，方向相反且互为条件。本文诊断的是感知能力的退化（失聪），《管辖克制》主张的是在感知完好前提下主动选择不看（克制）。两者的关系必须说清：克制以感知为前提——听得见才谈得上选择不听；若失聪已普遍，则克制的逐案评估无人能做，那套制度工艺包会退化为新的勾选流程。因此本文是《管辖克制》的适用前提，也指出了它最现实的失败方式。这一先后关系应在两篇之间互相标注。

增补三：法触觉的可测形式

法触觉若不可测，退化就无法被观察。两项指标：异质性识别率——在含有非法律规范争点的案件中，裁判文书明确指认该争点具有规范异质性（而非事实分歧或情绪因素）的比例；误置率——将规范异质性处理为事实认定问题的比例。两项可从公开文书批量编码，且可跨时段比较以检验退化趋势。第三项为回报结构的直接测量：在绩效考核指标中，与识别异质性相关的项目所占权重——若为零，本文关于不对称的主张即获得制度文本层面的直接支持。

增补四：限界

本文不主张效率是错的，也不主张法律应当受理一切规范争议。它的主张仅限于一点：当回报结构对“看见”不给奖励、对“看不见”不设代价时，一种感知能力会在无人有意的情况下持续退化。据此，本文不能推出任何降低效率的一般建议，只能推出一条更窄的要求——在考核结构中为识别异质性设一个非零权重。这个要求小到几乎不引人注目，而本文认为它正是唯一可行的入口。

编辑增补所依据的核验文献

Sally Engle Merry, “Legal Pluralism,” Law & Society Review, 22(5), 1988.

Niklas Luhmann, Das Recht der Gesellschaft, Suhrkamp, 1993.

Michael Power, The Audit Society: Rituals of Verific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Marc Galanter, “Justice in Many Rooms,” Journal of Legal Pluralism, 19, 1981.

Christopher Hood, “A Public Management for All Seasons?” Public Administration, 69(1), 1991.